

評介洪健榮《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學》

陳東昇^{*}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、國立臺北商業大學校史館行政專員

壹、前言

本書之作者洪健榮，現職為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兼海山學研究中心主任，研究領域為：清代臺灣社會文化史、臺灣方志學、臺灣區域史、近代西學東漸史。洪氏在這些領域中著有學術期刊論文 50 餘篇，除學術專書或篇章外，亦參與地方志書編纂 6 本，成果確實斐然。¹

洪氏自就讀輔仁大學時期，便參與《泰山志》的撰寫，後續於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攻讀碩士學位，復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取得博士學位，其研究發展方向或可由求學歷程窺知梗概。早期著作為明清時期東西交通史，後來逐漸轉向臺灣史研究範疇，不過即使如此，仍可見到其開闊的研究視野，兼容不同的觀點與史料。著作也遍布於風水堪輿學、知識史、文化交流史、區域史等領域，著作能量頗高。本書可稱為其十數年來的研究集大成，呈現作者對於清代臺灣方志研究的新視野。

自中國明清以來，傳統中國方志纂寫反映帝國政治文化的秩序，也成為施政者對於當地事務的參考，具有極高之政治意涵。² 臺灣自進入清帝國版圖後，方志修纂持續不斷，也因此累積許多文本可供後人研究，成為當今臺灣史學界的熱門議題。迄今大多數研究都專注在方志內容的考證與觀察，本書則由知識史的脈絡，提供學界新的思考方向。整體而言，本書確實有達到作者所設定目標，釐清清代纂志者對於地方知識的建構過程，以及如何與執政者思想達成和諧的需求。

* 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供寶貴的修改建議。本文初稿曾蒙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吳文星榮譽教授指點，還有蘇識宇先生提供修改建議，在此一併致謝。然本文如有缺失，文責仍由筆者自負。

1 詳參：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網頁：<https://history.ntpu.edu.tw/?p=2490>（2020 年 12 月 28 日檢索）

2 陳捷先，《清代臺灣方志研究》（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6 年），頁 1-13。

貳、內容簡介

作者開宗明義指出，清代臺灣地方修志盛行，然不能忽略其設計主體，是為了有利主政者觀風察俗和行政措施的方式。因此，修志者的資治宗旨與才學識見，將直接影響內容與論述取向；而體例門類的設計既是修志的前提，也是執行的先決條件，維繫修志者的才識與理論。³ 作者認為，現今對於方志的研究仍不脫兩大面向：「關於方志史料及其運用價值的探討」，以及「透過方志史料來建構清代臺灣史事、地理景觀或解析特定時空的社會現象」。⁴ 不過，將方志的分門別類視為特定的知識範疇而進行的專題研究仍不多，該書即將方志本身視為一套知識系統，分析在分門別類後的本體論或世界觀，如何呈現在論述之中。⁵

第二章討論清代臺灣方志輿圖的政治文化意涵，作者認為清政府在設觀統治的過程中，透過方志輿圖的劃定與擴充，逐步將臺灣各地收編於帝國統治版圖之下，建立一個屬於帝國權力統治的範圍。從這個過程，可以見到統治階層如何將其意識投射至地方，形塑其文化與權力達到支配的樣貌，同時也見到漢族文化中心的意識形態，更是繪圖者的主觀意識表達。從這個觀察過程，可以理解繪製客體的過程也帶有主體的建構成分，當然就無法避免自身知識與認知所產生的偏見。

第三章透過清代臺灣方志學校門類的知識建構，討論國家教化的理念如何在地方傳承與達到落實。作者分析，清代臺灣修志的官紳，透過學校門類的知識建構，將臺灣置於符合儒家聖賢的框架之中，藉此展現國家文明施展於海外孤地之中，讓統治者見到國家權力的落實。反過來說，這也是一種宣示作用，代表臺灣已經確實被納入清帝國的版圖之中。作者也提

3 洪健榮，《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學》（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20年），頁3。

4 洪健榮，《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學》，頁7-10。

5 洪健榮，《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學》，頁10-11。

醒我們，方志編修除了可以做為宣告接受文明的象徵，同時也可以是批評不同文化的工具，對這些官紳來說，更是彰顯其治理政績的管道。

第四章藉由方志祀典門類的知識建構，討論修志官紳如何傳承清政府的資治輔政觀念，並且落實在祀典措施、禮制規範的書寫之中。官紳先是以近乎挪用方式承襲中國傳統論述，但是又必須強調儒學落實於新領土臺灣，代表劃邊域風俗為帝國領土，皇權擴及海外孤島。編修過程中也不斷整併臺灣的民俗祠廟，將其納入國家所認可的合法機構中，強化官員統治力量。

第五章以方志的風俗門類，討論官紳如何透過方志修纂形塑符合統治階層期待的價值觀。官紳透過修志過程，因地制宜調整原本沿襲的風俗類目，因應臺灣「番漢混居」的特色，呈現多民族情況。也因此，以漢人視角表現漢人艱辛開墾、筆路藍縷的樣貌，且仍有許多未受教化的土地有待開發。這樣的特色直到清代後期才逐漸淡去，「內地化」與「儒漢化」不再是重要特色。相對地，凡是不符合儒學價值的「陋習惡俗」便會成為纂志時重要的批判對象。⁶ 因此，在運用這些史料之前，必須先思考建構過程所帶有的主觀意識，避免單純透過漢文化為主體的有色眼睛看待歷史，需要回溯到歷史原點，設身處地為當時的情況重新思考。

第六章則是運用文獻解讀，以明代利瑪竇（Matteo Ricci, 1552-1610）為首帶入的西學知識，再到臺灣開港後的衝擊，將近代西學東漸史與臺灣方志學兩種取徑結合，分析方志中引述西學各種論述，理解修志官紳如何看待西學的進入與應對，也與先行研究者方豪（1910-1980）對話。作者特別指出，雖然西學論述在方志篇幅可能僅為冰山一角，但仍可讓我們省思當時代官紳如何理解與調適西方知識。大體上，西學在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系統中，多半屬於邊緣性或非主流位置，僅作為官方論述的參證，或

6 洪健榮，《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學》，頁 198。

是各式景觀與現象的點綴，可說是相對的從屬性。被採用的西學知識中，官紳重視其實用性、實證性或新奇性，是選擇性採用，對於帶有西方宗教信仰則是抱持質疑態度。

最終章的餘論中，作者分析以知識學角度考察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系統，可以得出三個重點取向：

- 一、宣導主政者的統治政策，達成大一統帝國同風共俗的資治教化功效。
- 二、因時地而制宜的纂修原則，使地方志書發揮功效。
- 三、刻意強調臺灣島域如何趨向中國禮教社會，並批斥與統治階層的價值意識抵觸的現象。⁷

最後，作者提示我們，清代臺灣方志還有其他體例門類值得深入探究，甚至清代臺灣的特定方志也值得分析，考察志書間的傳承與相互影響效用。以及，隨著時間流轉，時序衍伸至日治與戰後的影響是否持續，還有清代方志在臺灣史學使得該如何定位，都有待後續學界深思。

叁、綜合評論

過去蔚為主流的方志學研究，主要集中在考證臺灣方志的編纂人員、版本源流、體例特色等內容，著名的研究者有方豪、陳捷先、尹章義、張勝彥等學者，素為方志研究者所引用。再者，亦有許毓良、楊護源及林淑慧等人，透過方志內容建構特定時空的臺灣社會。此外，透過方志書寫討論隱含的政治思維也不算少數，如王志宇和李文良等學者，從這些為數不少的著作可見方志研究之興盛。本書作者透過編纂方志的知識建構角度，探究各門類書寫特色，其實也非首創，陳捷先便曾提出方志書寫反映帝國

7 洪健榮，《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學》，頁 244。

文化秩序的看法，⁸ 高志彬也曾數度討論臺灣方志修纂的流變，帶動學界不少討論風潮。⁹ 其後亦有林開世¹⁰ 與李文良¹¹ 討論方志書寫的知識策略。故總的來說，洪氏雖非首位察覺方志編纂者的知識影響方志纂修方向，但本書仍為本研究較全面性的探討，當然有其貢獻與重要性。

有關本書的討論，應可分為兩個面向，分別為清帝國史與地方史的角度。

首先是清帝國史的角度，本書呈顯清代帝國如何形塑其大一統觀念，表達官方教化遍及各地，所有臣民雨露均霑。地方官員，也透過這一套機制，向上傳達統治績效，以利上位者瞭解地方統治情形，對臺灣這塊海外版圖快速理解。¹² 以學校門類與祀典門類為例，透過這些建置宣示官方統治力量進入各地，版圖之內無不得到教化，也能理解儒家聖賢之言，並透過官方認可儀式彰顯正統性的重要，人民紛紛仰首嚮往。

就風俗門類來說，則說明「番」人處於禮教之外的樣貌，但是隨著時間進展、官方統治深入，「番」人陸續得到禮教洗禮，逐漸進入帝國統治的範圍內。又以知識學切入，清官員為了解釋臺灣納入清帝國版圖，需要連結兩地的關聯性，使臺灣這個孤懸海外的化外之地成為清帝國一份子，面對西學東漸之際，不得不調適自身的知識與價值觀，以中國傳統文化為中心，納入西方知識於其中，使原本的知識體系不被破壞，也能得到修正。從作者這些史料分析與論證過程中，我們確實看到清帝國如何觀察臺灣這塊土地，反過來，也理解修纂志書者如何將臺灣的統治政績呈顯給統治階級。

8 陳捷先，《清代臺灣方志研究》。

9 高志彬，〈臺灣方志纂修概況與內容特質〉，《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》15 期（1990 年 6 月），頁 36-43。

高志彬，〈臺灣方志之纂修及其體例流變述略〉，《臺灣文獻》49 卷 3 號（1998 年 9 月），頁 188-189。

10 林開世，〈方志的呈現與再現——以《噶瑪蘭廳志》為例〉，《新史學》18 卷 2 號（2007 年 6 月），頁 1-60。

11 李文良，〈清初臺灣方志的分野、山脈書寫與帝國意識形態〉，收於黃永豪、蔡志祥、謝曉輝主編，《邊陲社會與國家建構》（新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17 年），頁 361-391。

12 類似著作，還可參考：莊勝全，《萬文遙寄海一方：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》（新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13 年）。

就地方史的角度，本書也說明了地方知識如何在清代修志官紳的價值觀下，創造出一個因地制宜的架構，填入這些在地觀察，形成一套被編排過的知識體系。但即使如此，作者也提醒我們應該注意到，許多的內容可能是沿用與傳鈔而來，是否能代表編纂當下的最新知識，恐怕是值得再三思考的。作者還有一點值得稱許的是，相當紮實的梳理方志內容，以表格方式讓讀者能更快速、更清楚理解方志的分類內容，如表 2-1（頁 46-50）、表 3-1（頁 97-99）、表 5-2（頁 194-197）。作者的分析途徑提醒我們，除了考究清代方志內容的真實性，以及社會現象，也要小心這些地方知識同時反映書寫者的主觀價值，若是未能理解方志編輯脈絡、書寫者背景，則無法有效分析記載內的知識建構論述。¹³

即使如此，本書仍有些許缺憾有待補足。本書名為《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學》，內容探討自然以臺灣方志為核心，第六章中的西學與方志論述雖然具有充實史料，然畢竟僅為臺灣方面文獻，只可見到單一面向。倘若以此例回頭觀望中國其他區域，甚或是鄰近臺灣島的福建，是否仍受到西學如此影響；以及中國其他邊疆地區，是否可見到帝國教化的洗禮，相信是不少讀者感到好奇的問題。若作者能於內容中稍作比較研究，應更具說服力。

或許就如本書推薦序所言，作者豐富的修志經驗給自己不少啟發，理解方志在修纂過程中的知識權力關係；再加諸其自陳，於碩博士班修課過程中不斷對於方志如何分門類提出質疑，才能有此獨特之觀察方式。綜言之，本書確實是臺灣方志研究脈絡中的重要著作，不僅費心爬梳方志記載，仔細歸納各門類特色，也能巧妙借用知識史研究路徑，以堅實的史料為依據，不但具有開創性，更是一本相當出色的方志學研究。

13 類似著作，還可參考：李文良，〈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31 期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，2003 年），頁 141-168。

參考書目

壹、專書

洪健榮，《清代臺灣方志的知識學》。臺北：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2020 年。

莊勝全，《萬文遙寄海一方：清帝國對臺灣的書寫與認識》。新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13 年。

黃永豪、蔡志祥、謝曉輝主編，《邊陲社會與國家建構》。新北：稻鄉出版社，2017 年。

陳捷先，《清代臺灣方志研究》。臺北：臺灣學生書局，1996 年。

貳、期刊

李文良，〈清初臺灣方志的客家書寫與社會相〉，《臺大歷史學報》第 31 期（臺北：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，2003 年 6 月）。

林開世，〈方志的呈現與再現——以《噶瑪蘭廳志》為例〉，《新史學》第 18 卷第 2 號（臺北：新史學雜誌社，2007 年 6 月）。

高志彬，〈臺灣方志纂修概況與內容特質〉，《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》第 15 期（臺北：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籌備處，1990 年 6 月）。

高志彬，〈臺灣方志之纂修及其體例流變述略〉，《臺灣文獻》第 49 卷第 3 號（南投：國史館臺灣文獻館，1998 年 9 月）。

參、其他

國立臺北大學歷史學系網頁：<https://history.ntpu.edu.tw/?p=2490>（2020 年 12 月 28 日檢索）